

同为一国人却不能自由交谈

普通话艰难诞生之旅

□华声

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,南京话、北京话,成为中国官定“标准音”的主要竞争者,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,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、流动、融合的重要工具。下图左: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(中)在初来中国之时,还曾在宁波试图创造一种汉字罗马化字母,以便于学习。下图右:1956年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,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。



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

1845年6月15日,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,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:“我的中国男仆(宁波人)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、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,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,不禁有些气馁。”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。在宁波,施美夫看到“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。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,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”。

这一年,距五口通商不过3年,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。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是汉语,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,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。

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俗人情,为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提供方便。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,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,在那里,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,也在无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。

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,既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,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,地方官吏的数量极为有限。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,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“官话”(即首都方言,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)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。毫无疑问,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,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。因此,只

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,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。

然而,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,施美夫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:百舸千帆的码头,南来北往的商贾,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起来。初到上海,他看见吴淞河北岸“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兴建”,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。

1853年,太平天国定都南京,长江下游富庶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。十余年间,作为江南唯一的安全区,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数百人,急剧膨胀为1862年的50多万人。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上海的繁荣,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,上海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(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)的大杂烩。

形形色色的“官话”

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,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,从沿海到沿江,从中原腹地到内陆边疆,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通商口岸。

方言的坚冰虽已破裂,但通行全国的标准音却迟迟未能诞生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,还有一种语言在局部地区担当着通用语角色,它就是官话。

1845年,施美夫在宁波发现:“由于地方方言繁多,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,成为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。”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。

同样是官话,却各自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,如“北京官话”“天津官话”“山东官话”“南京官话”乃至“绍兴官话”“广东官话”等。这种

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“蓝青官话”,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产物。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,但都趋近北京话,因而在沟通上不会遇到特别的困难。

事实上,早在1844年,施美夫在广州学习北京官话时,就曾发现戏班里的演员说的都是南京话(他以为这是旧官话),听起来却没有什么障碍。

然而,官话却不是人人都会说的。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,字音要一个一个地“死记硬背”,学习的难度非常大,因此,在方言区,官话基本上成了上层社会的专利。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面对差异较大的方言,仍会像施美夫的宁波男仆一样摸不着头脑。

受方言困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。早

在1728年,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碍政令之传达,下令在官员中推广官话。他要求各地设立“正音书院”,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、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。规定8年以后,福建、广东两省,凡是举人、秀才、贡生、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。然而,推行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不那么难懂,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话、厦门官话、广东官话而已。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100多年后,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(广东新会人),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,在留声机、电话、广播等语音媒体产生之前,文字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。清政府满足于汉字“书同文”的便利,自然无意为统一语言做太大的努力。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,官话的版图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

老国音的诞生

然而,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打败了中国,也使部分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。从魏源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到洋务运动的盛极而衰,再到维新思潮的兴起,普及现代西方文化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。此时,繁难复杂、无法直接拼读的汉语无疑成了普及新式教育的头号难题。

1892年,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,厦门人卢懋章出版切音字专著《一目了然初阶》,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。在该书的序言中,他第一次提出了“语言统一”的口号,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。

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。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,本土语音称为吴语。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,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。此后,中原战乱,汉人多次南迁,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。

明朝建立时,朱元璋定都南京,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。明成祖迁都北京,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130多万人

口,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,他们主要居住在内城,而将原在内城居住的本地居民迁出城外,因此当时北京人说的仍是南京官话。

清朝初期,沿用前朝旧制,仍以南京官话为正音。直至1728年,雍正设正音馆,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,南京官话才结束了作为中央政府官方用语的使命。在300多年的时间里,借助政权的力量,南京话得到广泛的传播,从而对各地官话甚至方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

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,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。

满洲人关以后,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,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。但是,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,也不会发入声,因此,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,也被戏称为“五音不全”的汉语。

1728年,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,其地位便迅速抬升。到清末和民国初年,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,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最广的语言。

不仅如此,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湖北话接近古夏声,主张以湖北黄陂话为标准音。

然而,这场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的范围。同盟会会员江苏人吴稚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,强烈反对“狗叫”式的京腔。但同时也反对以其他方言作为标准语,主张以“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”。

民间争论如火如荼,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。1911年,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——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,通过了“统一国语办法案”,并建议成立“国语调查总会”,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。

至此,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。

但是,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。为了尽快确定汉语的标准读音,民国政府教育部1913年2月15日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,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《音韵阐微》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,这就是通常所说的“老国音”。

直到新中国 普通话才得确立

“老国音”诞生之时,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,顾不得推广国音。不久后,二次革命爆发,再往后,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,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。直到1918年,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“国音”字母,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《国音字典》,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制成功。至此,“老国音”才正式在全国推广。

然而,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一场名为“京国之争”(指京音和国音)的大辩论。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。

“老国音”是一个“折中南北,牵合古今”的“标准音”。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,但也因此成为一种“人造语言”。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“国音”为母语的人群,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“国音”进行交流沟通。

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,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。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,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,教的人觉得难教,学的人觉得难学。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:“在13年的时间里,这种给4亿、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,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。”

由于“老国音”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,因此,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“老国音”。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,但吴稚晖、刘孟晋等学者认为“老国音”明确区分尖团音,阴阳上去入五音俱全,最能代表汉语的丰富性。双方争执不下。

“老国音”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,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,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。

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,留学生中“废除汉字”的言论也随之兴起。1918年钱玄同发表《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》,号召“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”,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。随后,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、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。紧随其后,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,诸如蔡元培、黎锦熙、赵元任、林语堂、周辨明、许锡五等人,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,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,掀起了“国语罗马字运动”的浪潮。

所谓国语罗马字,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、韵、调。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“老国音”的比较复杂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。因此,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,要求简化语音,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,修改国音,去掉“老国音”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。

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,“京国之争”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。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《国音字典》的增修问题时,吴稚晖放弃了维护“老国音”的主张,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宣布“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”。1932年,政府公布《国音常用字汇》正式确定“新国音”为标准读音。

“新国音”确立后,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、广播等手段,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,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。然而,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,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。抗战结束后,紧接着又是3年内战。因而,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,统一国语的目标仍未实现。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汉语的统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。经过长达6年的反复研究和群众讨论,最终于1956年2月6日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》,正式确定普通话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,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,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”。